

#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理論框架與香港角色

蔡赤萌

---

[提 要]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特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跨境區域整合,是“一國兩制”理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在實踐中的有機結合。未來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的功能角色,以帶領大灣區國際化和市場化為主要方向,以拓展香港的獨有價值為重點,包括大灣區國際化建設引領功能、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的高端服務平台、金融開放防火牆與金融安全保險閘、對接全球創新資源打造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等。為此需要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探索與創新大灣區區域經濟治理模式。

[關鍵詞] 粵港澳大灣區 “一國兩制” 區域經濟一體化 香港角色

[中圖分類號] F123.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026-13

---

在改革開放 40 年後的今天,以國家戰略形式重構區域發展藍圖,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與建設,承載著新的時代使命。如何客觀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特徵,充分挖掘和拓展香港的獨有價值,探索香港這一獨立關稅區如何從“一國”視角、如何作為國家區域核心城市在粵港澳區域開放發展中發揮其獨有價值,不僅對大灣區核心競爭力的構建與高層次對外開放新體制的構建,而且對國家新時代對外開放戰略的順利實施乃至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效建設,均具有重要意義。

## 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理論分析框架

從區域經濟層面看,香港在內地對外開放中功能作用最為顯著的,集中體現在香港與其腹地珠三角之間的經濟帶動與互動關係。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內地通過漸進性的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地參與到經濟全球化進程。香港之於內地,是對外開放逐步融入全球化過程中的重要窗口、特殊橋樑、試驗場;回歸後的香港又有著“一國兩制”下“國內境外”的獨特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因應內地對外開放不斷深化與戰略轉型、整體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結構調整,香港在珠三角開放發展中的角色與經濟關係也不斷轉型,從開始時的帶動功能,到後來的“前店後廠”式的垂直互補功能,到今天已形成相互融合的水平式、多層次的互動關係,香港與廣東珠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目前國家將港澳一併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進行整體規劃,這是粵港澳區域經濟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的重大戰略,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發揮港澳開放型經濟在推進粵港澳區域實現更高層次對外開放中的獨特作用。粵港澳大灣區與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並列為國家

級區域發展戰略,從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合作的發展路徑、合作模式、推進動力及協調機制看,有著自身區域發展特徵,是特殊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跨境區域整合。

#### (一)“一國”之下的跨境區域合作與區域經濟整合

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屬於特殊的經濟區域關係——“國內境外”,具有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的部分特徵。粵港澳大灣區,是特殊的經濟一體化區域,既是一國之內的地方區域,又是具有國際間跨境區域的特徵。在“一國兩制”架構下,香港與內地屬於 WTO 下的兩個獨立關稅區,香港與廣東省的經濟關係,既是一種特殊的外部關係,香港處於“國內境外”,參照外資管理;同時也是特殊的內部關係,是“一國”之下制度相異的不同關稅區之間的經濟合作,服從於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兩地之間的經濟深化合作與協同發展,需要遵循 WTO 規則下獨立關稅區之間的規範,需要通過簽署類似自由貿易區協議來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逐步消除關稅等阻礙要素流動的成本。自 2003 年以來,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及其 10 項系列補充協議,以及 CEPA 框架下的《服務貿易協議》、《投資協議》、《經濟技術合作協議》、《CEPA 貨物貿易協議》,制定了廣東珠三角地區區域發展規劃、粵港合作框架協議,通過多層次的政府間合作機制,制定共同的合作重點和策略方向。

從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趨勢看,香港與內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區,一方面有區域經濟整合、要素有效配置、逐步走向共同市場的內在需求。在合作形式上,從跨境要素互補合作、製造業垂直分工的“前店後廠”模式,轉向功能性整合,服務貿易自由化下的產業橫向整合;在推動力上,從市場主導的自發性合作,轉向政府推動的制度性合作,突破了市場自發性整合的局限性與制約。但另一方面,由於兩地開放程度、基本經濟制度、稅收政策、人均收入等差異較大,而廣東作為內地關稅區的一部分,其稅收、金融及其他經濟政策受制於國家整體經濟制度的開放與發展進展,因此粵港兩地經濟很難達到完全對等的要素雙向自由流動。一旦要素完全流動開放,由制度性差異導致的套利行為,會對不同地區產生複雜影響,地域規模較小的港澳特區將面臨空間承載壓力。

“一國兩制”下香港“國內境外”特殊地位,既是香港的獨特優勢所在,保留了香港原有的兩制優勢以及與內地的差異性,同時也會對其與珠三角腹地進一步融合產生一定阻隔,兩地間要素流動受到不同關稅區跨境流動的管理制約。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中面臨諸多挑戰,如傳統產業合作互補性有所下降,重複建設、產業同構現象明顯;由市場推動的粵港澳區域深化經濟合作遭遇瓶頸;原有粵港澳合作機制協調成效存在局限等,也都與此相關。為此,需要創新“一國兩制”治理機制,探索香港與國家及珠三角經濟關係的互動空間與路徑方向。

#### (二)“一國兩制”理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的有機結合

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對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理論解析。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區域整合為基礎,旨在提高區域間資源的利用效率,在一體化內最大限度消除阻礙貨物與生產流動的障礙,實現各成員國(地區)資源和要素最佳配置的過程和狀態。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經歷了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的動態發展過程,其形式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深化,可分為五種組織形態,也大致對應著一體化發展的五個階段: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和完全經濟一體化,開放程度依次擴大。在現實中,區域經濟一體化每種形式都可以獨立出現,具體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可兼有兩種或多種類型的某些特徵,由各成員國(地區)根據需要作出選擇。自由貿易區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最基本的形式在實踐中應用十分廣泛。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各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區蓬勃發展。自由貿易區是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國家或經濟體之間簽署協議,取消關

稅和與非關稅壁壘而形成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自由貿易區具有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由於其形式在一體化運作中存在差異，經濟福利效應也不盡相同。共同市場是相對較高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式，在共同市場內，不僅實現貿易自由化，而且實現了要素的自由流動，形成產品、服務與要素的統一市場。共同市場理論認為，在共同市場中由於消除了阻礙生產要素流動的壁壘，生產要素在逐利動機驅動下會向獲得最大利益的地區也即要素邊際生產率較高的地區流動，進而提升經濟效率改善區域福利。共同市場推動的區內要素流動與配置效應，在資本要素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相對而言勞動力要素流動則因受到社會、政治和生活習性等因素影響不易大規模流動。<sup>①</sup> 1993年1月歐洲共同市場的形成，標誌著共同市場理論的現實運用。

按照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目前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程度，已達到自由貿易區階段，正在擴展部分共同市場功能。兩個獨立關稅區之間建立了類似的自由貿易區協議，通過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及其系列補充協議)和投資協議等，逐步打通內地與香港間貿易、投資等要素的流通渠道，兩地間人員流動也逐步趨向便利。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大力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構建更高層次的國際貿易投資網絡。與此同時要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港澳的獨特價值。在新時期內地對外開放戰略目標下，在“一國”之內兩個獨立關稅區，通過簽署協議或政策協調，逐步增加了除貿易物流之外的金融要素自由流動的管道功能，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的便利政策也陸續出台，近期以先行開放內地對港澳居民的同等待遇為重點。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的示範區、制度創新先行試驗區，將先行先試探索區域經濟深化合作的配置收益和制度紅利。近年來，香港與廣東珠三角和澳門之間，以區內要素便捷流動為主要特徵的共同市場功能正在加快建立中，區內部分政策的協調程度也會有所加大。

“一國兩制”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屬並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該理論系統回答了與祖國統一相關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以“一國兩制、祖國統一”為目標，對怎樣實現祖國統一、已實現祖國統一的港澳特區如何保持繁榮穩定等基本問題做出系統科學的回答。“一國兩制”理論具有很強的實踐型特徵。該理論主要是將其基本概念、範疇、原理應用於各門具體科學或實際工作，解決其中帶有普遍性的實踐問題，並將實踐中的經驗、認知再進行概括，上升為理論，用其指導新的實踐。因此，“一國兩制”理論具有其突出特色，例如鮮明的時代性、論斷的前瞻性、科學的創新性、顯著的實踐性、體系的開放性，<sup>②</sup>並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完善。

“一國兩制”構想的設計目標，是要在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的同時，維護和促進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一國兩制”理論及相關制度，規範了香港與內地的獨特經濟關係。“一國兩制”保留了香港原有的兩制優勢以及與內地的差異性，保留了香港對於內地對外開放中的核心功能與戰略價值——一個連接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和經濟制度的天然窗口和橋頭堡。香港一直是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一環，高度開放和國際化構成了香港的核心優勢，香港與中國內地特殊的經濟合作關係及其相應功能角色，也建基在制度差異及國際化功能上。

回歸後，港澳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一國兩制”理論內涵，從國家統一理論轉向國家治理理論。中共十八大提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和三個“有機結合”，中共十九大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將“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納入十四項治國方略之一，並提出“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強調要“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sup>③</sup>如何把握

“一國兩制”下香港與中國內地的經濟關係適宜走向、粵港澳區域一體化建設的融合程度；如何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有效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作用，拓展其發展空間和增長動力，涉及“一國兩制”在經濟領域的實踐，尚缺乏成熟的理論指導，需要探索“一國”之下不同關稅區之間的合作與互動的特有規律與變化趨勢，這是在“一國兩制”下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重點和難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在借鑒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與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一國兩制”的中國特色，探索區域經濟發展的創新實踐。大灣區將以制度創新方式繼續“先行先試”，探索區域高質量發展，從“集聚效應”進一步轉向“輻射效應”。<sup>④</sup>

### （三）在“一國”之下“兩制”的差異性整合和有限度整合

鑒於“一國兩制”架構下香港與內地經濟關係的獨特性，香港與廣東珠三角之間的區域經濟整合，在發展目標與運作模式上均呈現出自身特性，是一種差異性整合和有限度整合，並將以漸進性、試驗性方式推進。

其一，差異性整合。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質是三個開放程度上存在較大落差的地區整合，港澳是以自由港為基礎的高度開放經濟體，而珠三角開放程度與經濟政策則受制於中國內地整體發展進程，但又具有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政策紅利。粵港澳大灣區經濟深化融合，既有可以作為的空間也面臨不少制約。從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看，粵港澳大灣區，不同於歐盟以政策一體化為目標，也不同於內地其他區域間的經濟合作與治理，其發展目標並非消除“兩制”差異，而是要在保持“兩制”的前提下進行差異性整合：既長期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特點及相異於內地的獨有價值，又能在“一國”之下通過規劃性整體安排，最大程度地消除影響兩地間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障礙，以達致資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和“兩制”優勢最大化。這種區域整合模式，與現有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與實踐模式存在區別。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存在諸多差異，包括制度差異、政策差異、規模差異、文化價值觀差異等。差異性整合，就是要在尊重“兩制”差異的現實前提下，尋求協同發展，更好地發揮“一國兩制”紅利，並盡可能為區域要素流動創造條件。

其二，有限度整合。區域經濟一體化，決定區域經濟整合動力；同時“一國兩制”制度差異，則決定香港與內地經濟整合的互補性和有限性。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融合發展，將呈現有限度整合這一特徵，既不同於歐盟東擴後出現的南北間差異性整合（其最終發展目標是趨同，是要逐步消除差異），<sup>⑤</sup>也不同於其他灣區城市群之間的區域合作模式（在同一經濟制度下不同城市間進行產業一體化與空間一體化佈局）。從大灣區建設總體目標看，是要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在更高層次參與國際競爭並形成國家新增長極；通過政府共同規劃粵港澳深度合作的藍圖，構建“結構科學、集約高效的大灣區發展格局”，成為內地和港澳深化合作的示範區、高質量發展典範。其中，並不涉及行政、法律和政策一體化內容。就建設路徑而言，是要依照灣區內自然形成的經濟基礎，根據區域發展的總體目標，開展合理定位與有效合作，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和集約高效的產業發展格局，加快向全球價值鏈高端邁進。其原因，一是基本法規定了“一國”之下香港特區的“兩制”模式；二是兩地社會經濟基礎、空間規模及對區域融合的發展需求存在差異，所主張的要素流動方向與節奏也不盡相同。以2017年數據為例，香港GDP約佔大灣區的23%，人口佔11%，而面積僅佔2%。因此在推進大灣區要素流動訴求上，香港民眾更多地是希望內地及珠三角進一步擴大市場開放深度、香港居民能在內地/珠三角享有國民待遇相關的各種權利及便利；至於香港向內地開放，則較強調香港空間規模及城市承載力的局限。而內地民眾，則比較關注內地居民

赴港澳的便捷流動,期望縮小人員流動的非對稱狀況。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需要兼顧現實社會基礎,其區域整合的有限性又表現為漸進性、試驗性。

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一國兩制”理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的結合與融合,需要在實踐中探索和創新大灣區經濟整合的發展模式,創新“一國兩制”治理機制。

## 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一國兩制”探索

“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基本制度特徵。在“兩制”架構下,香港與珠三角之間的管理邊界,既是“兩制”核心特徵,又是進一步融合的自然屏障,影響區域間經濟要素的高效配置和重組。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在大灣區差異性整合中充分發揮香港的獨有價值,是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探索。

香港一直是全球最為開放的經濟體,國際化是其最大的特色,也是其經濟競爭力的優勢來源。長期以來,香港經濟的主要功能,是作為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城市節點、區域經濟的總部經濟、鏈接歐美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一環。正是基於國際化優勢,香港得以在內地及大灣區對外開放及國際分工體系調整中扮演著聯繫內地與國際市場的特殊中介角色。在大灣區建設中,香港作為區域核心城市之一所扮演的功能角色,既要遵循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一般規律,也承載著國家發展戰略中的特定功能。在大灣區共同打造成國際經濟競爭格局中的世界一流灣區過程中,發揮香港獨特優勢的方向,是要帶動珠三角國際化、市場化發展,在經濟、社會等方面進一步與香港接軌、與世界接軌,使大灣區在率先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過程中成為國家重要的增長極和產業鏈的高端區。與此同時,大灣區建設,也為香港獨特功能的發揮與拓展,提供了新的空間。

### (一)大灣區為推進香港與國際及內地經濟的雙重融合提供平台

國際化優勢及經濟活動的國際性,是香港競爭優勢的關鍵,也是香港在國際經濟中發揮戰略角色的支撐基礎。在國際分工體系中,香港憑藉國際化優勢,一方面與世界經濟高度融合,另一方面則與中國內地經濟開放發展關聯密切、持續深化融合。香港雙重融合的特殊角色表現為,在國際分工體系鏈條中,對跨國公司而言,香港是其產業鏈條的中間環節,承接產業鏈條中游的功能。如上世紀70年代香港所形成的國際製造業中心地位,便是承接第三次國際分工的結果。相對於中國內地而言,香港是國家對外開放的窗口,連接國際生產體系的渠道,位居出口加工製造業組織者的上游,承擔訂單承接、生產組織、貿易運輸等功能。對於內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區,香港處於價值鏈上游,發揮著輻射帶動功能。正是這雙重融合及雙重角色的組合,構成香港在經濟全球化體系中的功能角色和獨特定位。<sup>⑥</sup>

如果細分香港經濟優勢,可以發現其既有競爭優勢具有以下兩大特點:一是香港的產業競爭力優勢更多地體現在對外經濟競爭力。國際社會各類評估機構對香港產業競爭力的判斷基礎,大多與香港經濟的對外競爭力相關,尤其是國際市場拓展、全球供應鏈等方面競爭優勢。香港在經濟自由度和營商環境的國際排名,一直比較靠前(見表1),該兩指標並非競爭力的全部,主要體現的是各經濟體在資本全球流動、經濟全球化時期的對外競爭力,反映其吸納外部資本流入的能力、參與國際市場的深度。這對於一個高度依賴外部資源和市場的經濟體而言,卻尤為關鍵,關係到其生存以及基本經濟功能的發展。二是其優勢主要體現在全球資源配置功能,而非經濟體量。在經濟功能和全球城市的國際評估中,國際機構關注重點是城市的經濟功能,城市控制全球戰略性資源、產業和通道的能力。因此,促使香港成為世界前列全球城市的主要因素,是其全球資源配置功能,也

即國際金融中心、資本運作中心和物流供應鏈網絡等。<sup>⑦</sup>近年來香港國際競爭力排名一直位居前列,也得益於香港作為國家及大灣區開放的門戶效應和“一帶一路”節點功能。

表 1 香港經濟競爭力國際排名(2014~2018)

年份	世界競爭力 (IMD)	全球競爭力(WEF)		營商便利度 (世界銀行)	經濟自由度	
		總指標	創新因素		傳統基金會	弗雷澤研究所
2014	4	7	23	3	1	1
2015	2	7	27	5	1	1
2016	1	9	27	4	1	1
2017	1	6	26	4	1	1
2018	2	7	26	5	1	1

資料來源: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世界銀行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世界經濟自由度報告。

因此,儘管香港經濟在體量上的相對優勢正在逐漸減弱或消失,但香港在內地及大灣區開放發展中依然具有獨特價值,其優勢更多地體現在區位優勢、法律制度和專業化優勢等軟環境上,體現在作為國際資本地區總部和營運平台的全球城市綜合功能上。迄今,在國際經濟排行榜中,香港躋身世界城市的較頂級層次,是國家首要的全球城市;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居於世界前列,由英國智庫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聯合發佈的第24期全球金融指數(GFCI 24)中,香港排名全球第三,僅次於紐約、倫敦;在資本集聚方面,作為內地與全球間資本流動中心地位突出,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佈的《2018年世界投資報告》中,香港直接投資流入量和流出量分別排名第三和第五(見表2);在貿易物流領域,物流供應鏈樞紐功能較為優勝,在世界銀行公佈的貿易物流效率指數(LPI)排名中一直位居全球前十;在專業服務方面,全球高端生產者服務業集聚優勢也十分顯著。香港上述優勢,將是未來深化與內地及大灣區產業合作、在國家新一輪對外開放中發揮新中介功能的重要市場基礎。基於上述優勢形成的國際金融中心、現代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樞紐、高端專業服務積聚平台等功能,也是內地及大灣區未來高質量發展和高層次開放所要倚重和支持的戰略功能。

表 2 香港直接投資流入量和流出量的國際排名

	2006	2014	2015	2016	2017
直接投資流入量	9	2	3	5	3
直接投資流出量	11	2	8	8	5

資料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世界投資報告》,2016年、2017年、2018年。

## (二)大灣區建設有利於善用“一國”之利拓展香港功能

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創新的核心,是要探索“一國兩制”經濟治理有效模式,在差異性整合中更好地發揮“兩制”的獨特作用。通過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更好地發揮香港獨特優勢,進一步拓展“一國兩制”的制度紅利,將有效提升香港長遠發展動能。大灣區規劃與建設,強化了頂層設計和政策供給,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發揮獨特作用打通經濟要素便捷流動的渠道。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設立,在機制層面有效提升了區域跨境協調統籌的效能,為區域協同發展及香港獨有



價值的拓展創造有利條件。

其一,通過戰略性謀劃,借助國家在新全球化中引領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提升香港對外經濟競爭力,拓展香港在大灣區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建設中的引領角色和新中介功能。

拓展香港產業基礎和發展動力,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不僅是香港特區的责任,也是國家戰略需要,是國家治理在“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具體體現。從全球競爭實踐看,競爭性、戰略性產業的構建,離不開政府的引導與產業政策的扶持。從內地與香港經濟互動關係看,國家已有實力也有能量帶動香港戰略性功能的構建。由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正成為全球化的新形式,由此形成了由中國企業主導新的投資鏈和產業鏈,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及其國際地位也在不斷提升,對香港高端服務功能及鏈接國際規則的制度建設提出新的需求。中國內地已經成為全球化重要組成部分,“一帶一路”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五年來已與 103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 118 份合作協議,並與 13 個沿線國家簽署或升級了 5 個自貿協定。<sup>⑧</sup>中國內地是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2017 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 27.8%,超過美國、日本貢獻率的總和。目前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自由貿易區關係已全面覆蓋,並且可在中國自貿區戰略推進中產生疊加與聯動效應。與此同時,國家已在重大發展戰略推進中為香港發展預留空間。在政策層面,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乘國家快速發展順風車的具體通道與合作平台已陸續建立。下一步,深化合作及推進兩地要素便捷流動,是要在現有基礎上,在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多個領域有所突破,通過共同編制大灣區發展規劃等多元形式,帶動特區政府對經濟的引導能力及其對戰略性產業發展的規劃與促進功能。

其二,通過強化對香港功能的利用以及有針對性地補短,鞏固香港既有功能、培育內生動力,拓展產業鏈新優勢,為香港在大灣區角色功能的發揮奠定市場基礎。

對國家而言,大灣區建設兼顧了多層需要並創新了合作模式。既體現國家區域發展戰略需求、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也高度關注香港長遠發展及其戰略功能的有效發揮。一是用好香港所長。借助香港的國際化優勢,發揮其在國家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建設及粵港澳一流灣區建設中的國際化引領角色,挖掘並強化香港在珠三角外向型經濟發展中的新中介功能,在新時期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為內地成長起來的跨國公司提供高質量的國際化服務。二是借助國家的實力和規劃效力,帶領香港有效融入國家發展,有針對性地幫助香港補短,培育其內生動力。近期重點是,創新兩地市場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支持香港完善科創生態體系、建設國際科創中心,構建香港長遠發展競爭力的產業基礎;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突破口,系統梳理和有效完善區內要素便捷流動的具體運作模式,疏通合作痛點,有效促進香港既有功能的發揮、戰略性新功能的拓展、民生福祉的改善。依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引導市場力量,培育香港產業高端新鏈條。

### (三) 大灣區建設有助於延伸香港獨特價值,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參與全球競爭、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載體,未來重點是要依託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引領大灣區建設開放型經濟高端平台,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和國際競爭優勢。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獨特角色,以發揮自身所長,帶領大灣區國際化和市場化發展為主要方向,以拓展香港獨有價值為重點,帶動相關功能的拓展與強化。

其一,大灣區國際化建設引領功能。香港可結合服務業產業及營商環境的既有優勢,在引領大灣區產業鏈國際化發展中重點挖掘以下功能:大灣區全球價值鏈管理的主要樞紐,海外資本營運和全球資源配置中心;大灣區跨境物流配置樞紐,尤其是全球快速流動的國際樞紐,利用香港航空運輸的優勢,對接珠三角和國際市場間電子商務貿易需求;大灣區對外總部集聚地,提升服務能級,擔

當大灣區新供應鏈的世界級服務中心；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的重要外向環節和國際技術轉讓平台，尤其是加大力度引入國際先進科技資源落戶香港，通過香港科研類機構購買國際先進技術，並與珠三角企業合作轉化；引領大灣區開展以規則為核心的制度創新，對接國際一流灣區，建立大灣區國際標準。在參與大灣區發展中，香港可將深化與珠三角合作和促進自身產業升級、民生改善以及社會發展等“內功”結合起來，借助“區域所有”來彌補“香港所缺”。

其二，大灣區“一帶一路”節點功能中的綜合服務平台。香港可依託其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区位优势、發達服務業經濟要素集聚與輻射能力以及與東盟緊密經貿往來等基礎，將既有經濟優勢向“一帶一路”全球新的增量市場複製和延伸，打造聯繫東盟、輻射東南亞和南亞重要經濟帶的綜合服務平台，服務好國家發展所需的重點產業和特定領域。一是作為“一帶一路”區域最重要的金融中心。重點是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功能和雙向投資平台功能，發揮其在國際資產管理、人民幣離岸中心門戶地位與樞紐功能等方面的獨特作用；參與“一帶一路”金融合作機制，作為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區域內主導性金融機構和多邊機構的全球金融合作中心。二是“一帶一路”區域貿易物流中心和供應鏈管理樞紐。利用香港全球化業務網絡及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等功能，提升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商貿配置及營運功能，向“一帶一路”區域延伸；拓展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供應鏈管理樞紐功能，協助內地與國際市場聯通、與國際市場規則接軌。三是“一帶一路”高端專業服務平台。發揮香港“一國”之利下熟悉內地的先發優勢和專業服務業的綜合優勢，將香港的服務業優勢與珠三角製造業產能優勢及龐大的“一帶一路”新市場潛力結合起來，發揮香港配置全球戰略性資源和提供資源流動主要通道的功能，如作為“一帶一路”新供應鏈世界級服務中心、產業跨境轉移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橋樑與服務基地、風險評估與控制服務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等功能。四是通過完善粵港澳跨境要素流動機制，優化與整合大灣區資源配置，進而提升區域產業競爭力及其“一帶一路”節點功能新優勢。

其三，大灣區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高端服務平台，率先探索對外開放升級版。打造國際競爭格局中的世界一流灣區，需要建設開放型經濟高端平台，為大灣區國際化和高端化發展創造條件。香港是國際化的大都市，國際高端資源要素彙聚，開放水平極高，人文交流經驗豐富，在全球經濟社會發展與文明交流的價值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獨特優勢。在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推進過程中，需要借助香港的國際窗口功能，作為實施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探索。一是利用香港與國際接軌的成熟市場機制，帶動大灣區構建外向型經濟的機制與規則，率先對接國際標準；二是通過制度創新，營造國際化營商環境和生活環境，提升對中高端外資的吸引力，提高利用外資層級；三是發揮好香港在探索實現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協調、聯動發展有效機制中的特有作用。借鑒香港自由貿易港及其運作機制，深化自貿試驗區改革，推動廣東自貿試驗區在產業引領、政策創新及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等方面的引擎效應。探索在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個法律體系的異質城市群內跨境區域合作的有效融合模式，為大灣區及內地外向型經濟體制建設提供示範借鑒功能。

其四，國家及大灣區金融開放防火牆與金融安全保險閥。近年來，內地金融業持續擴大開放，金融風險防範和管理的壓力更加凸顯，急需建設並提升與金融業發展和開放相配套的金融管理水平，需要借助及借鑒香港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與國際接軌的成熟管理制度，為內地新時代的金融發展、金融開放和金融安全提供高端服務。一是在國家金融領域漸進式對外開放與人民幣審慎國際化步驟中，繼續發揮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窗口與試驗地功能。例如，進一步擴大香港聯通中外資本



市場的金融管道和轉換器的功能機制,拓展“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基金互認等模式,實現更大程度的互聯互通等,為內地資金進行國際化配置以及國際資本進入內地資本市場投資提供市場轉換對接平台。二是在自貿區、自貿港的金融開放試點中,提供與國際規則相通的運作及監管借鑒功能。三是協助國家在離岸市場管理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後所面臨的匯率波動風險、內地金融進一步開放後可能涉及的風險管理,未來重點是拓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深度和有效性,豐富人民幣金融產品,拓展人民幣海外定價中心功能,配合人民幣國際化從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向國際投資及儲備貨幣轉變需要。四是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區域影響力,促進深圳、廣州金融在大灣區的協同發展。依託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功能,推動金融與創新科技的深度融合,發揮包括創業資本、風險投資以及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等在內的創新金融對大灣區科技產業創新發展和崛起的支撐作用。

### 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其實質是探索“一國兩制”框架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踐模式,借助“一國”優勢有效發揮跨制度區域整合的最大經濟效應。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是對區域經濟理論的新補充,可為世界提供跨制度區域經濟合作的獨特經驗和模式示範。

#### (一) 大灣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踐模式

區域經濟一體化相關理論,從不同視角解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路徑、模式特徵與經濟效應,但未能有效覆蓋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踐模式。

從空間角度看,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同步覆蓋了多個層次類型,既有國際不同關稅區之間經濟整合的特徵,甚至包含了部分南北型經濟整合的基本要素;同時也是一國主權下區域經濟整合,而且是跨制度的區域整合,在國際上無先例可循。從合作形態看,大灣區由市場推動的自發性經濟一體化,也即功能整合的效應已經釋放,未來建設重點是制度性整合,也即需要協調參與方的體制與機制,通過簽署區域合作協定和規則,構建一系列的政策安排和規劃指導體系,克服區域內經濟分工與合作中的體制機制障礙。近年來以完善大灣區體制機制建設為重點的制度創新,正在全面探索,但三地跨制度的區域整合,在協調空間上會有所局限。

從目標取向上看,大灣區建設務實地將問題導向與區域發展目標導向有機結合,將大灣區建設置於新時代改革開放大方略、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大棋局來謀劃。在原則導向上,堅守“一國兩制”根本宗旨,在推進粵港澳區域合作中,將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與支持港澳繁榮穩定相結合,挖掘差異性整合的最佳效應,拓展香港服務國家大局的戰略價值,並有針對性地為此消除區域整合中面臨的瓶頸障礙。在目標取向上,因應粵港澳區域合作發展階段的需要,依據大灣區市場基礎和經濟發展落差的消弭程度,以優化大灣區資源配置、完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快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打造具全球競爭力的營商環境等為重點,通過制度創新為大灣區制度性整合提供所需的政策供給。在推進策略上,根據區域客觀基礎以及制度性整合階段性特徵,有重點地予以推動。目前已公佈推動大灣區建設六大工作重點,具體包括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要素流動便捷高效、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加快推進重大平台建設和共建優質生活圈等。上述目標取向與策略重點,均為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基礎,是在自由貿易區功能的基礎上,向以制度性整合為特徵的共同市場功能升級。從大灣區制度性整合重點來看,目前主要是消除歧視與逐步放鬆要素流通限制,探索保障市場有效運行的制度機制,尚未涉及通過修訂法律和專

設機構以實現區域內部宏觀政策目標的整合,也就是說,其目標並未覆蓋共同市場全部內容。在差異性整合的漸進式推進中,大灣區各城市經濟運行規則將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進而形成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推動形成區域內各生產要素高度集聚化、產業分工高度協同化、經濟發展高度一體化的世界一流灣區格局,藉此形成區域增長極。

## (二) 香港與珠三角區域經濟深度融合中的制約

雖然粵港澳大灣區在總量規模上已進入世界四大灣區行列,但相對於國際一流灣區,大灣區內部產業協同發展、要素高效配置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效益仍未能有效發揮。香港與珠三角區域融合發展中出現如下特徵,面臨若干制約。

其一,進入產業內水平式競合新階段,產業同構及同質競爭的成分增大。在大灣區內,已形成廣東製造業及服務業與香港服務業之間多元、多層次產業合作格局,部分產業鏈已進入與香港水平競爭階段,在服務業多個產業與香港引發同質競爭。

其二,珠三角產業自主發展與香港疏離程度有所擴大。香港產業供給能力與內地發展需求出現一定程度錯配,在新的分工體系中缺乏產業鏈高端優勢,嚴重影響到香港參與新一輪產業分工的能力及其角色地位。珠三角製造業經過產業持續升級與轉型,已開始邁向中高端;珠三角服務業體系也日臻完善,經濟自主發展能力不斷增強,港口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對外貿易直銷能力不斷提高,逐步替代、分流了香港貨物貿易、港口運輸、物流配送等服務功能。目前在珠三角,推動產業鏈國際分工合作的主導力量已出現逆轉,從原來的港商轉為外資和本土大型企業。

其三,原有粵港澳合作機制事權有限,在區域經濟整合中協調成本較高。相對於內地京津冀和長三角區域發展,粵港澳三地跨制度經濟整合協調成本較大。分屬三個獨立關稅區,實行不同的制度和法律法規,行政模式、政策手段難以銜接,在信息、邊檢和市場等管理上存在差異。從跨境府際治理層面看,粵港澳三方屬於平行主體,政府事權有限,合作中涉及的不少具體政策,超出原有合作機制框架內協調範圍,需要國家有關部門授權。為此,在協調機制組織架構需要提升層級、強化中央統籌功能。目前已成立由國務院副總理韓正牽頭、包括粵港澳三地最高行政領導,以及國家發改委、國務院港澳辦等相關部委領導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

其四,制度性整合需要兩地政府協調經濟政策及縮小區域差異。港澳與廣東經濟制度不同、法律相異,又分屬三個不同的經濟體和關稅區;三地的關稅水平、資金流通制度、投資開放程度、對外經濟政策亦有實質性的區別,因此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融合深度與要素流動的自由程度,尚有一定的局限。一方面,大灣區建設,需要按照城市群發展規律有效協調“兩制”間跨境合作,包括城市定位和產業佈局,為產業要素便捷流動提供制度性保障;但另一方面,大灣區內資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流動便捷程度,仍將受制於內地服務業開放程度與兩地經濟政策差異。

針對粵港澳深化合作中面臨的利益平衡、產業競爭、制度摩擦、政策協調、合作主體地位不對等現象,<sup>⑨</sup>需要正視大灣區經濟跨制度合作和差異性整合的客觀特性,在吸收國際、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模式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探索大灣區區域一體化發展路徑,並建立相應的合作體制與協調機制,有針對性地解決區域融合發展中的現實制約。

## (三) 以規則和制度建設為核心探索區域一體化路徑

新時代國家對外開放再起步的重點任務之一,是要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現實中,香港與內地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還涉及到政府與市場、經濟與社會、不同關稅區不同城市間的多層面協同發展,涉及到“一國兩制”跨境府際協同治理,無疑對“一國兩制”

治理模式與治理機制提出新的要求。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研究制定,標誌著粵港澳區域合作進入新的階段,從過去的跨境產業自發合作、以區域政府間合作為主的模式,轉向有國家規劃目標引導的跨境協同發展與跨境區域治理。香港作為引領大灣區開展以規則為核心的制度創新的功能更加突出,需要對接國際一流灣區,建立大灣區國際標準,探索跨境要素流動的相關制度設計,以規則為核心推進大灣區市場一體化。

其一,完善大灣區區域跨境統籌協調機制,強化頂層設計、協調目標方向。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設立,在機制層面有效提升了區域跨境協調統籌的效能。未來,以制度性安排作為協調合作的重要途徑,克服影響區內城市分工和產業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將成為大灣區制度性整合的重要特徵。2017年底以來,國家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系列重大項目、重大舉措相繼落地。以內地先行對港澳居民開放同等待遇為重點,陸續開放港澳居民在內地的就業、就學、置業等領域,允許港澳同胞申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港澳居民居住證》,在內地可憑居住證依法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依法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等權利。此外,正逐步放寬重要經濟要素的流動管制,為科研資金、高科技人才、重點行業設備材料及相關人才開放綠色通道。

其二,加快大灣區城市群內規則規範和標準的統一。利用香港成熟市場經濟的經驗與制度規則,在大灣區建立統一的規則和標準,在粵港澳城市群內逐步加大三地市場的融合程度。首先是粵港澳三地商品市場的一體化,統一三地產品製造、檢測標準與商品進入市場規則。其次是服務市場進入標準與規則的統一,可先在廣東自貿試驗區設計和創新一個全新的服務市場開放模式,成功後複製到整個大灣區乃至全國。三是調整現行服務業管理體制,改由按照市場運行規範,主要由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來確立進入標準和進入方式;也可複製目前世界服務市場中行之有效的准入方式和行為規範。<sup>⑩</sup>四是通過深化分工組合,構築一體化、內外市場連接的國際商品供應鏈與物流鏈,搶佔新分工體系的核心樞紐環節,提升大灣區國際分工地位。

其三,探索大灣區一體化建設中市場機制與政府功能有效銜接與互動模式。市場化、法治化方式,是“一國兩制”下不同制度、不同關稅區之間跨境區域合作、差異性整合的有效方式,也是香港經濟的優勢所在。結合內地政府引導與香港市場主導各自優長,在大灣區城市合理分工、大灣區現代產業生態體系構建中,注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產業空間佈局層面,要激發市場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力,在市場規律與市場機制的基礎上,形成大灣區以新經濟為主導的現代產業生態體系;在城市群協同發展層面,要深化城市間合理分工與功能互補,發揮各自相對優勢,鼓勵各城市以各自特色與優勢切入全球城市分工體系,在更大空間尋求外溢效益。<sup>⑪</sup>

其四,共建大灣區科技創新生態圈,合力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和高質量增長典範。打造科技灣區,是大灣區建設的內涵特徵與新目標,也是區內核心城市轉型升級、集聚優勢、走向高端的重要路徑。大灣區可借助香港營商環境、知識產權保護、國際網絡、資金融通便利、科研人員出入境便利等優勢,將香港研發優勢與深圳高科技製造能力結合起來,率先形成創新驅動模式。重點包括:積極融入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吸引中央創新資源佈局大灣區,構建跨區域科技創新網絡,夯實大灣區科技創新的技術基礎支撐;合作佈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促進大灣區創新生態體系建設,合作構建科技企業孵化體系;利用香港國際化優勢,共同打造全球高端科創人才、優質科創資源要素集聚平台;借鑒、吸收香港經驗並轉化為制度創新,帶動大灣區優化知識產權制度,逐步完善三地知識產權合作機制;以深港科技創新合作為主體打造大灣區開放型科技創新體系,協同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將“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深圳科創園區”作為探索深港科技創新要素資源無障礙配置和便利

流通的試點區,推進科技創新要素資源配置的一體化和市場化。目前,香港特區政府已與中科院簽署《關於中國科學院在香港設立院屬機構的備忘錄》,中科院將在香港建設具全球影響力的“綜合創新研究院”。

其五,有序促進區域要素雙向便捷、高效流動,控制好要素雙向便捷流動的方向和節奏。經濟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是開放經濟的重要標誌,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經濟效益的基礎條件,但需要政府具有與之相匹配的協調能力和風險監管能力。在推動大灣區要素便捷流動方面,建議以高效、便捷、有序流動為目標,在客觀評估灣區經濟社會相互交融需求並做好配套措施基礎上,逐步擴大要素流動的範圍,分層次、有選擇、有重點的多元開放。先行探索以落實香港居民在內地的同等待遇為重點,也即內地單向先行向港澳同胞擴大開放,逐步落實香港居民在珠三角工作和生活的同等待遇,完善福利可攜性政策以及雙方的制度銜接規定。針對內地居民,近期重點是根據兩地產業合作及經濟發展需要提供內地相關人才進入香港的便利措施,開啟綠色通道。根據粵港居民往來的現狀和需求,分階段擴大深圳及珠三角其他地區人員赴港高效便捷流動範圍,優化並完善大灣區居民赴港人員簽注政策。此外,支持重點產業合作與要素流動。對雙方商定的其他鼓勵性領域,考慮設立科創人才“綠色通道”,簡化內地專業人才的引入流程和赴港便利,逐步推動科研資金和其他科技要素的雙向便捷流動。

####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目標是要建設成為“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打造高質量發展的典範”。如何在跨境多中心區域內進行合理的城市定位和錯位發展,從而實現區域高質量發展,如何達成跨境協調機制高效統籌和有效運作,如何實現三個獨立關稅區內生產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動,如何處理粵港澳進一步融合對各地的社會政治影響及管治挑戰,<sup>④</sup>均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需要面對的難題,在國際上尚無先例可循。為此,要從“一國兩制”區域經濟整合的自身特性與發展目標出發,通過制度創新在區域協同發展中獲得新突破,借助香港的綜合優勢並有效拓展香港獨有價值。一方面,要在基於競爭優勢的市場自發合作的基礎上,從國家戰略需求角度與香港優勢相對接,以“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進行頂層設計,加大對香港戰略價值的利用,在利用中進一步強化香港戰略功能;另一方面,要兼顧“香港所需”,從頂層明確區域合作的功能目標、強化政策供給,尤其是要針對事關香港長遠發展的結構所缺或發展瓶頸,幫助香港逐步培育根植本土的核心競爭力。

就政府功能而言,未來重點是要發揮政府在大灣區發展目標引導、基礎設施建設和共同市場構建方面的規劃與協調作用,為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創造條件。

在國家層面上,要強化頂層設計和規劃引領,構建大灣區“結構科學、集約高效”的發展格局,則需要以全域思維來重新審視粵港的比較優勢,重新理順粵港產業的整體格局以及兩地的分工,細分各城市定位,提升產業一體化協同發展。一是借助中央政府的規劃和引導能力,在合作中幫助香港建立有區域規劃引導的經濟發展及協調能力。在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統籌下,完善協調機制,建立中央、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等不同層次和領域的統籌協調工作機制,形成決策共商、區內各城市規劃與大灣區規劃有機銜接的協調發展局面。二是推進產業協同發展,舒緩產業同質競爭的負面影響。三是協調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使區域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領域的銜接、使用和建設規劃,更具整體效率,在適度競爭中取得區域效益最大化。四是為重構新的產業鏈條、形成香港新優勢創

造條件。支持深港合作打造國家高端科創平台,吸引國際優質科技資源落戶大灣區,以科技創新重整製造業優勢。五是採取穩妥、審慎的推進策略,有序促進區域要素高效便捷流動,可先單向後雙向、先局部後整體,注重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解決問題。<sup>⑩</sup>

在特區層面上,參與由國家層面制定的大灣區發展規劃,意味著香港將融入有國家規劃指引的城市群發展體系中,香港需要有與之相配套的、相對清晰的城市功能定位、發展藍圖及實施路徑。為此需要切實發揮好政府的促進推動作用,推動香港建立對戰略性產業的發展引導與政策支持功能,在以下領域有所突破。一是借助大灣區規劃的制定和實施,研究制定中長期產業發展策略性規劃和具體的產業政策,可考慮推動香港逐步將零散的策略性發展規劃功能集成相對完整、有一定約束力、能與內地發展戰略相對接協調的產業發展規劃類指引。二是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平衡有效監管和促進發展功能,有重點地修訂影響香港總部經濟和投融資平台功能的法規,為新經濟發展創造條件。三是繼續加大對科技創新研究的支持力度,完善現有政策資源的使用效率,重點支持發展若干適合本土市場的高新技術產業,拓寬產業基礎,培育支撐經濟長遠競爭力的內生動力。四是對接即將公佈的大灣區發展規劃,做好本地落實與有效推進。目前香港政府正持續加大對戰略性行業的支持,並專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全面統籌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事宜。針對大灣區日漸龐大的要素高效流動需求,做好香港社會的設施配套與動態擴容準備。

① 敖麗紅、袁紅清:《灣區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1~14頁。

② 榮開明:《關於“一國兩制”理論體系的深層次思考》,澳門:《“一國兩制”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④ 陶一桃:《經濟特區與中國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歷史進程的理論思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8年第3期。

⑤ 彭剛等:《新入盟成員國與歐盟經濟整合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36~41頁。

⑥ 張玉閣、郭萬達:《香港經濟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與策略選擇》,北京:《港澳研究》,2013年第1期。

⑦ 封小雲:《香港經濟特點及優勢分析》,北京:《港澳研究》,2017年第3期。

⑧ “一帶一路”五周年:與103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118份合作協議,搜狐網,2018年8月28日, [https://www.sohu.com/a/250533585\\_160320](https://www.sohu.com/a/250533585_160320)

⑨ 陳廣漢、楊柱、譚穎等:《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以粵

港澳大灣區為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5月,第21~24頁。

⑩ 封小雲:《“十三五”時期粵港澳合作深化的思考》,載何亦文、劉瀾昌編著:《十三五規劃與香港:定位、機會與挑戰》第十七章,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66~173頁。

⑪ 曹鍾雄:《大灣區領導小組會議解讀③:五維協同構建粵港澳城市群空間發展格局》,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綜研觀察》,2018年8月20日, <http://www.cdi.com.cn/detail.aspx?cid=5594>

⑫ 蔡赤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挑戰》,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7年第4期。

⑬ 張玉閣:《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願景和推進策略》,北京:《紫光閣》,2018年第12期。

作者簡介:蔡赤萌,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成都 610065

[責任編輯 劉澤生]